



C2012080879

世 界 学 术 名 著



历史书写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法] 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 / 著
倪复生 / 译

当 代 世 界 学 术 名 著



历史书写

[法] 米歇尔·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 / 著

倪复生 / 译



C201208087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书写/[法] 塞尔托著; 倪复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3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5166-3

I. ①历… II. ①塞… ②倪… III. ①历史编纂学 IV. ①K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8244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历史书写

[法] 米歇尔·德·塞尔托 著

倪复生 译

Lishi Shux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55mm×235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5.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3 000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征服者记述（第五章）

探险者（阿美利哥·维斯普西）来到名字叫“美洲”的印第安妇女前

杨·梵·德尔·斯特拉特（Jan Van der Straet）创作的寓意画，其中的历史性的会面给人以神秘的感觉，让·狄奥多西·布利（Jean-Théodore de Bry）和奥本海（Oppenheim）于1619年以此创作了《十分之一的美洲》（*Americae decimal pars*）（参见J. Amsler的《文艺复兴》，89页，巴黎，1955；以及L. M. Parias：《世界探险史》，第二册）。

第二版前言

发现者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 le Découvreur）⁹从海上来。他身着铠甲，站立着，手里拿着欧洲的定向仪，身后的舰队是用来向西方运送来自某个天堂的珍宝的。他面前是一位赤裸的斜躺着的名字叫“美洲”的印第安妇女，尤为特别的是，在这不知名的妇女的周围，各类动、植物都透着一股异域风情。^{〔1〕}序幕由此拉开。坐在一根木柱做的门槛上惊诧了片刻之后，这位征服者便开始“书写”这位妇女的身体，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的“历史”。通过自己的加工和想象，他将自己的这种历史装扮成为了一首刻画细腻的颂诗。这就是“拉丁”美洲。

这种色情的、尚武的情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体现了书写在西方的一种新用途。不过，杨·梵·德尔·斯特拉特（Jan Van der Straet）的作品也刻画了人们面对这片土地时的诧异之情，其中的维斯普西是第一个准确判断这是一片“新大陆（nuova terra）”、一个地图上并不存在^{〔2〕}的新大陆的人。这块不为人知的大陆注定要被标上发现者的名字（Amerigo）。但随之而来的，便是以武力来说话的土地垦殖。这就是“征服者的记述”。它要把这个新“世界”当成一张白纸（未开化的），并按照西方人的意志在上面进行书写。它要将别人



10 的空间也变成自己生产体系的扩张领地。西方所记述的历史就是在记述的主体与客体相脱离的情况下、在“书写的意志”与“被书写的身体”相背离的情况下形成的。《历史书写》(*L'écriture de l'histoire*)是对作为历史实践的书写研究。

四个世纪以来,每个科学活动都是以自圆其说(以“恰当的”语言和话语)为特征,而且这类自圆其说能够改变事物、改变从事物中历练出来的人物(依文本而言,这是周边世界的一次改革或革命),《历史书写》则是关于这种自圆其说的“现代”史。因此,首先要将本书看成一个系列的研究,它们旨在阐述书写这种实践的时代变迁,例如在16世纪,“人种志”的书写便历经了“未开化的”、“原始的”、“传统的”或者“大众的”等一系列口述特征,在本书中,我将其归为其他类(见本书的第三部分);基督教书写在17—18世纪的演变中,呈现出一种纯粹是“表征”或“迷信”的宗教宇宙观,这已被用来构建人类历史的伦理体系,且其还在实践中被边缘化了(第二部分);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文字实践,在临近20世纪之际,书写又回归到了被压抑着的相异性(第四部分);本书的最后便是介绍现实中的历史编纂学的“工业”体系^[3],它表述的是在社会经济生产领域里,一系列精专的规则以及叙述或文本的构建(第一部分)。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本书还补充了发生在18世纪末期的一种“明晰的”、革命性的、雅各宾党人的有关文字合理性的抗争,以便讨论方言口述中所特有的摇摆不定的语言表达。^[4]

11 对这种完全依从线性时间来进行重构的编年学^[5]而言,弄清楚“现在”看来更为合适一些。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去研究领域、素材、步骤等“特殊性”(这也是“现代”历史编纂学要面临的東西),并依照这些来分析文字书写以及各“方法论之间的差异”(符号学的、精神分析的等等),这就为向西方书写的发展进程中注入其他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书中的各个篇章,作为战略性的观察,每一篇都有自身的规律,如社会认识论方法(第一部分)、史学方法(第二部分)、符号学方法(第三部分)、精神分析方法(第四部分)等。摒弃

虚幻的无所不包的元语言，为的是要暴露“狭隘的”科学阐述和其所阐述的但却不充分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要避免那必然是独断主义的虚构，这种虚构会使人盲从“言之确凿”的事实，要摒弃隐藏着的作为历史编纂学研究先决条件的哲学幻想。谢林（Schelling）曾满怀豪情地宣称“真实地叙述事件是我们的天职”，这就是处在哲学幻想下的勃勃野心。这种叙述是欺骗人的，因为它是以真实为名行炮制规律之实。

从“历史编纂学”（也就是说“历史”和“书写”）这个名称来看，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或谓这是矛盾形容法，也即将两个二律背反的术语放在了一起，二者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话语。历史编纂学的任务就是要陈述它们，在陈述中，这种背反的关系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一直以来似乎都是这么陈述的。本书就是讨论“话语”与其所陈述的事实之间所存在的关系。^[6]那么，“历史”和“书写”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书写犹太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在犹太基督教教义中，宗教考古学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改变了术语以及过去，并赋予历史编纂学以加工者的形象而非阅读和阐释者的形象。从这点来看，应对历史编纂学的可操作性从两方面来加以审视，一是从政治的问题着手（“历史研究”所采用的程序就是借鉴“历史制作”的某种方法），再就是从主体的问题着手（叙述性的话语以及人）。在“科学的”书写规律压制下，主体的问题是要么杜撰要么沉默的问题。^[7]

12

【注释】

[1] 参见本书插图页。

[2] 参见沃什伯恩（W. E. Washburn）：《15、16 世纪发现的意义》，见《美国历史评论》，1 页及其后，1962；以及 Urs Bitterli：《从野蛮到文明》，19～80 页，慕尼黑，C. H. Beck 出版社，1976。

[3] 马克思原话是“在自然和人类之间，工业是其‘真正的’历史的联系”，这也是“人文科学的基础”。关于历史编纂学“工业”，参见塞尔托：《历史与书写》，见《今日政治》，65～77 页，1975 年 12 月。



〔4〕 塞尔托、多米尼克·朱莉娅 (Dominique Julia) 和雅克·勒维尔 (Jacques Revel) 合著:《语言政治, 法国大革命和方言》, 伽利玛出版社,《史学丛书》, 1975。

〔5〕 参见下文, 第二章, 三。

〔6〕 关于这一点, 参见塞尔托、雷吉娜·罗宾 (Régine Robin):《历史语言和现实》, 载《辩证》, 第 14 期, 1976 年夏, 41~62 页。

〔7〕 参见塞尔托:《16—17 世纪神话故事》, 第 4 部分, 伽利玛出版社,《史学丛书》, 1982。

书写与历史



“对所有的亡者而言，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勤奋的、善良的、温柔的……人，我就这样走着，一年又一年，数千年来，青春常驻，永不疲倦……。”道路就是“我的路”，道路上书写的似乎就是跋涉者的故事：“我走着，我漂泊着，我在征途上奔跑着……我走着……坚强的旅行者。”前进或者书写，都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征程，“受到渴望的驱使，受到强烈的好奇心的激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米什莱（Michelet）带着“宽容”以及“一种子女对父母般的敬畏”不厌其烦地探寻着亡故者，这些亡故者是“这种奇异的对话”的受益者，而且他还“确信”，“人们无法重新激活被生活所遗弃的东西”。在被历史学家占据的坟墓中，只有“空洞”^[1]。因而“和另外一个世界的亲密接触”^[2]是没有“危险”的，“这种安全感让我对这些不再能够伤害我的人更加的友善”。与这个消逝了的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接触越多，他也就越“年轻”。 13

在依次穿越了法国历史后，这个身影“又回到了他们的墓穴，不再有悲伤”^[3]。相伴而回的是叙述，也就是陈述。这是为一些永别者们而做的叙述。叙述以一种他们不曾有的礼遇在恭维着他们。叙述在尽孝道的同时，也为他们而“哭泣”，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在催促 14



着他去尽此孝道。在一个车站，他写道，“人们被要求闭上眼睛”^[4]。米什莱的“温情”由此及彼，为的是在时间中介绍他们，“这个多才多艺的废墟装饰家哦，这能美化万事万物的时间啊！”^[5]那些消逝的亲人们走进了书中，因为他们不再能说话，不再能为非作歹。这些再现的人受到了书写的欢迎，但他们却要一直保持沉默。

除了上述的永别者们，还有一个事物令人感到更加的忧伤。这就是民族，它同样也是一个永别者。“我生来就是民族，我心中装着民族……但它的话语，它的语言，是我无法理解的。我无法让民族说话。”^[6]它沉默着，它是诗歌咏叹的对象。的确，唯有它方可“准许”历史学家的书写，但同理，民族也没有进入到书写之中。民族的声音是无声无息的，它只存在于言语之外，存在于米什莱的叙述中。它的声音使得米什莱成为了一个“流行”作家，使其抛弃了自傲，“变得粗俗且野蛮”，使其“失去了……我只剩下了文字上的巧妙”^[7]。

再就是虚幻的历史编纂学。它所寻觅的目标，也正是它所推崇的且要葬送的东西。针对这种让人着迷的难以拒绝的亲近，人们进行了隔离。米什莱自己则成为了这样的一种分界线，从维吉尔（Virgile）到但丁（Dante），他们都进行了一些想象，但这些想象自此便不再是历史了。这种分界线揭示出一个问题，它也是某些科学实践一直要阐述的问题，而且围绕着该问题又形成了一门学科。“事实上，史学唯一要寻求的是‘意义’，这也是‘他者’所寻求的”^[8]，但矛盾的是，这种设想在于“理解”，在于用“意义”来隐藏这种与“他者”的相异性，反而言之，在于安慰一直徘徊到现在的亡故者，在于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字的墓穴。

分离的叙述：书写

现代西方史学实际上始自于过去和现在的分离。由此，史学与（宗教的）传统分离开来，但它从来就没有和传统彻底地分离过，它

和这种考古学维持着一种既需要又排斥的关系。最终这种割裂形成了第三种形式，它的主旨在于构建劳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张将叙述与（社会的）人进行一种分层。它要让沉默的人开口说话。它主张在进行叙述时，要和被表述的寂静隐晦的“事实”间隔一定的距离，也即要以一种距离来保护叙述（Gegen-stand）。个人的力量只有穿过间距，通过历史学家，方可看到有关某段时期的一些文献，方能进入到文字叙述中来，并通过这段时期的文献窥见事实的存在，反之，这种存在所遗留下的一些文献，一些喃喃私语，让人在远处便能感知到一种未知的博大，它威胁到人们的认知，也诱惑人们去认知。

这种历史编纂学表现出了一种与西方现代文化相适应的架构，这种架构通过将野蛮、过去、民族、精神异常、儿童、第三世界等调整为“自己的他者”，明晰了自己对于他者的立场，并且实现了转移（或者“发展”）。通过与人种学、史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交叉变异，产生了这样一个命题：它阐述的是一种他者未能言及的叙述知识，而且为了保障这样一门（人文）科学的诠释性的活动，它还设定了一条界线，以便将该诠释性活动与某个有待认知的领域分割开来。自从身体成为一幅可见的可阐释的图画时起，现代医学便成为了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学科，因为人们可以在一个语言空间内对其进行书写。人们从呈现在眼前的身体上看到的、知道的都可以用来相互提高、相互补充（相互阐释）。身体是一组数字，有待于人们去破解。在17—18世纪，人们就像翻书一样，将身体加以解剖，使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9]，这就使得身体从一个可见的身体转变成为了一个可知的身体，或者说身体从一个空间上的组织转变成为了一个词汇语义上的组织，反之亦然。类似的突变也发生在传统身上，它像一具死亡的躯体，以一种文本集的形式呈现在学者面前，供其观瞻。现代医学或者现代历史编纂学几乎是同时诞生的，原因就是会阅读的主体与会书写的主体之间是相互脱节的，其所用的语言本身也是难以理解的，它需要被解析。所形成的语言的知识与拥有知识的无声的躯体之间的分离成就了这两种“异种性”（关于他者的叙述）。



历史编纂学首先将现在与过去分离开来，并一再重复着这种分离。因此，它的编年史是以一个个的“时期”构成的（如中世纪史、现代史、当代史），在各时期之间，每一个时期的终结与否都会面临着抉择（如文艺复兴、大革命）。从作用上来看，每一个“新”时代都将之前的时代描述为“死亡的”，它青睐一个带有与先前决裂的各种标记的“过去”。因而，这类决裂是一种公设性的阐释（始自于现在的阐释）和一个时代的目标（种种分割也需要阐释）。由这种决裂所规定的研究活动是唯意志主义的。在与其相异的过去中，这种研究活动进行了一种挑选，将过去分为可以“理解”的以及应当遗忘的，为的是呈现当今的精神。对过去的这种挑选，造成挑剩下的废料没有了解释，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尽管这些“残余”、“遗留”或延续的存在会破坏阐释的“发展”或阐释体系的良好秩序，但仍要见缝插针对其加以提及。尽管仍会有一些语句上的错误，但这是由某个领域内的规律造成的。不过，这些错误也体现出了一种抑制，也就是说，为了同化可以想象的东西，因而要对某个时期内不可以想象的东西加以抑制。

这种建构并非自发而成的，它是西方特有的。例如在印度，“新形式不排斥旧形式”。或者说这是一种“分层堆积”。时间的步伐无须与过去保持距离来获得证实，也无须通过与“异端邪说”在某点上划清界限而实现定义。恰恰相反，一个“再吸收和共生的程序”成为了印度史的“基本的事实”^[10]。特提阿纳人（tetiarana，族谱中古人的名单）以及随后的唐塔纳人（tantara，过去的历史）构成了马达加斯加梅里纳人（merina）的“耳朵的遗产”（lovantsofina）或“口头的记忆”（tadidivava），它们是一种社会财富，社会是它的备忘录，它们还是储存起来的一种食粮，但不是为了一个可能的自立的现在，而是为了将它们抛在脑后。历史就是“偏爱”（唐塔纳），历史需要被忆及，为的是自己不被忘记。历史扎根在民族中间，民族有着过去，也有着未来。^[11]在达荷美（今贝宁共和国——译者注）的法罗人中（Fô），历史就是热缪罗（remuho），即“过去的话语”，是自上而下

传承下来的话语 (ho)。话语不同于概念 (表面相近, 实际它是源于人种志及博物馆志), 概念通过将时事与传统相区别、将过去和现在相隔离, 在如今, 它又通过捍卫西方立场、玩弄西方术语、利用过去的或边缘化的“黑人文化和精神价值”(négritude) 来定义身份。^[12]

18

有证据表明, 除了历史编纂学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对待时间的立场, 同理, 也有另外一种对待亡者的态度, 不过为此列举大量的例子是没有用的。在西方, 群体 (或个人) 通过排除 (就是创造一个适当的领域) 或通过占领一个制高点 (由此, 人文科学以及关于他者的专门知识形成了) 来树立信心。群体知道, 对死亡的胜利是短暂的: 割草机必然是要回来割的。死亡困扰着西方。从这点来看, 人文科学的描述是病理学的, 其中有夸张的辞藻, 有悲伤, 也有感情用事的成分, 我们的社会不再将死亡看成生命的一种模式。历史编纂学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指出, 亡故者们的再现构成了 (或正在构成) 整个文明的经历, 但要去信仰这些再现的亡故者却是不可能的。它还指出, “使其复归原处”是不可能的, 让人承认与已故者无甚关联且承认有一种无法消弭的限制等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历史编纂学消耗的是材料, 发展的是断言。消耗的是过程, 发展的是对过程的弥补和锤炼。历史编纂学想证明它所形成的领域是能够解释过去的, 它以现在的某种知识来概述过去, 它以新方法来触及死亡, 它还在论述中一再重复断裂, 为的是否认遗失。它研究死亡, 它对抗死亡。

19

这个矛盾的步骤可以用一种行为来加以形容和实施, 这种行为既起到传说的作用, 也起到了礼仪的作用, 这就是书写。实际上, 书写以一种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对缺失和制造进行描述的表述功能替代了那种立足于现在的传统的表征。书写的最基本形式便是在一张白纸上行文谋篇。然而, 在远离了古人的新时期重新开始的书写, 以构建新时期的理性为己任的书写, 难道就不是历史编纂学了么? 在我看来, 西方四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在于书写。它通过富有成效的实践慢慢地取代了以往所有的言传身教。作为实践 (不称之为论述, 因为论述只是结果), 书写表现的是一个社会, 一个能够管理好自己空



间的社会，它陈述的是“想要知道的”或“想要支配的”实体，而不是过去的朦胧不清的实体，它要改变承袭下来的成文的传统，最终要使之成为一张白纸，以便以之来书写。由这些野心勃勃的、不知疲倦的、功利性的、乌托邦式的实践构建起了一个“适当的”领域，这个领域记录下了以理性词汇所表达出来的意愿。实践还有一种科学模板的作用，它对隐藏着的且要加以找寻的“真相”并没有兴趣，它的特征体现在一个从时间上切分出来的新空间上，表现在一种操作模式（modus operandi）上。由这种模式衍生出一些“方案”，依据这些方案便可用今天能明白的话语来进行实践，确切而言，这就是“历史研究”。至此，历史编纂学与近代和当代的西方书写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历史编纂学有这么一种特性，它要驾驭文字来处理其获得的各元素。在此处的操作中，给予变成了构造，它以过去的素材来建立表征，以现在为坐标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同时还将传统当成过去（排除它），且什么也不丢失（要以新方法对其加以利用）。

历史与政治：一个领域

历史编纂学提出要与传统、与社会实体保持距离，这最终取决于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因其高效而在过去、在整个社会中都很突出。“研究历史”依靠政治力量，依靠这种力量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合适的空间（如城市、民族等），在这个空间里，人们能够且应当去书写（或构造）一种体系（陈述实践的一种凭据）。政治力量在空间上自行其是、特立独行，这早在16—17世纪便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对历史编纂学而言，有两个任务特别重要，即通过“政治家”和“法官”对历史编纂学进行改造。首先，权力应当是合法的，权力赋予强力以权威，强力让权力更加有效，权威又让权力更加可信。另外，还需要就“创造历史的念头”（政治活动的主题）和体现着行动与决策意志的“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对各种变量进行分析。各种变

量因为事关每次介入的强力的立场，从而变得重要起来。这是一种根据目标来驾驭复杂局面的艺术，它需要对某种意志（君王的权力）和某幅画（某个情景的素材）之间可能的关系进行“计算”。可以说，由16—18世纪的一些历史编纂学家们所构建起来的“科学”有两个特征：其一，这些人通常都是些富有的法官和行政官员，他们是些为君主效劳、伴君左右的人；其二，这是一个供“国家”以及“广大群众”使用的“有着特殊待遇的”领域，其中，文字的内容和高效的权力是步调一致的，即“地位显赫的文学”和掌权的“政府人士”是相互一致的。^[13]再者，这种言论即等于“批准”强力去贯彻意志；况且，它还强力准备了道德、政治、家族等渊源关系上的说辞，当它将强力转变成为了“价值观”，并以之构成对过去的表征之时，也就是对君主加以认可的现学“现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由过去构建而成的图画，也是现实视野中的“一幕幕”的写照，成为了某些人类行为学的模板，在历经一系列的坎坷后，最终形成了研究具体意愿以及其可能的变体的类型学；而在分析了失败和成功后，它又勾勒出了一门意志实践的科学。由此看来，它并不满足于从历史的层面来为君主辩护，它还为其提供了一个刻画细腻的族谱颂诗（blason）。这是一位政治管理技师总结出来的一个“教导”。

从16世纪起，或者说从马基雅维里（Machiavel）和圭恰尔迪尼（Guichardin）^[14]的创举之后，历史编纂学便不再用来表征神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部根据一个无法接近的、仅可以从一些符号中加以辨认的“主体”的意志来确定的历史。历史编纂学获得了书写的主体地位，也就是主宰的地位，它可以将“历史制作”当成目的。它还赋予智慧对现实和由其派生出来的意志之间种种纠葛加以规定的功能。它的定义是由国家理性来完成的：一种权力，它要“出击”，它要依据一些现成的材料，通过专门手法，来“处理”某个“环境”下的各种因素，以构建缜密的叙述。这种学科从其目标，即政治史来看，是战略性的；从其处理的材料、档案或文献的手法来看也是如此。



不过，历史学家要以此来自我定位却有些不现实。历史学家不是编纂的主角，他实际上是编纂的技师。他并不制造历史（faire l'histoire），他只是研究历史（faire de l'histoire），该部分冠词表示历史学家并非从自己的立场来做阐释，他所做的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但正因为如此，新型的历史编纂分析才得以出现。历史学家只是“围着”权势在转。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里，从历史论文到历史教科书，它们都隐含着历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历史学家的言论有些学究气，他不是主人，他完全是替政府传话，他并不承担责任和风险。他渴望他所没有的权力。他的分析“紧跟着”形势而动，他针对现在阐释过去，针对未来阐释现在，这也是着眼未来的社会展望学家的成就。

历史编纂学热衷于政治问题，但这不是在施展政治权力。这种情形有着双重的意义，且明显地表现在现代考古学上。这是一种兼具批判和想象的奇异的情形。在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历史和言论集》（*les Discorsi et les Istorie florentine*）中，这种情形就十分明显。当历史学家试图代替权力来建立政治行为规则以及优良的政治制度之时，他就是在扮演着不是君王胜似君王的角色；他在揣摩着君王想做的事情。这情形便是虚构，它为历史学家的言语打开了空间。这种既是主人但又是仆人的言论，拥有授权但却又唯唯诺诺的做派，实际上也是虚构，在这种情形下，这位技术员便能够像幕后的主人一般去思考、去再度演绎君主的问题。^[15]他依仗这“事实上的君主”，制造出“可能的君王”^[16]。他理应如此行事，似乎现实中的权力听从他的说教，不过和这逼真的表象相反的是，其说教的有效性仍取决于君主能否采纳其说教的民主体制。因此，这种幻想让政治分析介入到实际的权力运用中的可能性是很渺茫的。由言论所制造出来的“可能的君主”从来就不是“事实上的君主”。现实与言论之间的鸿沟从来就没有得到填补，当隔阂越发严重时，言论也便没有了意义。^[17]

在历史学家看来，上述痼疾让政治生活的效能变得捉摸不定（但一切似乎相反，政治人物倾向于采用历史学家的立场，模仿历史学家